



二十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下)

鄒振環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33)

(接續第一期)

三、20世紀80年代譯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陸學術界漸漸復蘇並重新活躍，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了依靠翻譯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人文思想對於中國整個文化轉變上的意義。伴隨着思想解放運動的掀起，翻譯出版界也形成了壯觀的譯作出版的大潮，同時也預告了中國翻譯史研究高潮的到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中國翻譯史研究最重要也是成果最多的時期。1978年起，安徽大學外語系教授馬祖毅在《安徽大學學報》上連續發表了《我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學”翻譯》、《五四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翻譯》等文章，在1980年的《翻譯通訊》上發表了《偉大的佛經翻譯家玄奘》、《徐光啓與科技翻譯》等文章。由大陸翻譯史研究的巨匠錢鍾書重寫的《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首先在香港《抖擻》1981年第1期面世，與同年香港三聯書店推出的劉靖之所編《翻譯論集》一起，不僅重新揭開了大陸地區翻譯史研究的序幕，也標誌着兩岸三地翻譯史研究接軌的開始。

(一) 中國翻譯史專題資料的彙編

1981年，香港和大陸幾乎同時啓動了翻譯史資料的整理工作。最早是香港三聯書店推出的《翻譯論集》。該書選編了自1901年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發表以來的三十多篇有關譯學的文章，內容分成三組：（1）屬於總論性質，主要談翻譯標準、翻譯原則；選錄有魯迅與瞿秋白（1899—1935）論翻譯的通信，有林語堂、趙元任、胡適、傅雷、陳康（1902—1992）、劉殿爵（1921—2010）、余光中、思果（1918—2004）、鄒嘉彥、董橋的文章。

（2）屬於專論性質，主要談具體的翻譯理論和經驗；收錄有朱光潛（1897—1986）、董樂山（1924—1999）、黃雨石（1919—2008）、劉紹銘、林以亮（1919—1996）、陳祖文、葛傳槩（1906—1992）、高克毅（1912—2008）、余也魯（1924—2012）、張樹柏、林文月的文章。（3）針對譯作、譯者的評介以及有關翻譯史事的敘述；收錄有錢鍾書、韓迪厚、梁實秋、伍蠡甫（1900—1992）、雷海宗的文章。^①其中所收董橋的《翻譯與“繼承外國文學遺產”商兌》、錢鍾書的《林紓的翻譯》、韓迪厚的《嚴復的翻譯理論及其影響》、伍蠡甫的《伍光建的翻譯觀點》、雷海宗的《由翻譯史看翻譯理論與翻譯方法》等，都屬於翻譯史研究的篇章。特別是該書前所載劉靖之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一文，集中討論了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分析了瞿秋白、魯迅、林語堂、趙元任、胡適、傅雷、林以亮、錢鍾書等在翻譯理論上的貢獻，指出中國翻譯理論發展的八十年始終是朝着同一個方向，即“重神似不重形似”，是對翻譯上“化境”的追求。^②這個解說見智見仁，筆者不敢置喙，但是作者根據韓

^{①②} 劉靖之主編：《翻譯論集》（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第371—372、1—15頁。

迪厚的研究，將嚴復提出“信達雅”的時間確定在1901年，卻延續了韓書的一個硬傷。

大陸於此時開始的翻譯史資料整理和編刊工作，以商務印書館貢獻最著。1981年11月、1982年6月，該館分別推出論文集《林紓的翻譯》和《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兩書。前者收入鄭振鐸、錢鍾書、阿英的文章，以及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後者收入王栻（1912—1983）、王佐良（1916—1995）、賀麟、侯外廬（1903—1987）、王汝豐、馮友蘭、李澤厚、張豈之等人的文章，後附《嚴復生平、著譯大事年表》、《嚴譯簡目》和《主要文獻書目和研究論文索引》。與上兩書配套出版的還有“林譯小說叢書”十種和“嚴譯名著八種”。可以說，正是這兩套叢書的出版，直接啓動了80年代後的以林紓、嚴復為代表的近代翻譯家生平資料的系統整理工作。如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薛綏之、張俊才編的《林紓研究資料》，全書分林紓生平及文學活動、林紓評論和研究文章、林紓翻譯作品考索、林紓著譯繫年，以及林紓研究資料目錄索引等部分，較之商務印書館編《林紓的翻譯》內容要豐富許多。此一時期其他翻譯家和翻譯機構的專題資料集的彙編，如《嚴復研究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4）和《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一百年》（以上均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等，或許有些不完全是為翻譯史研究而準備的，但這些資料的編刊為20世紀80—90年代後嚴復、林紓、伍光建等譯家的傳記研究和其他翻譯家、翻譯機構的專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同樣，譯史與譯論的研究也幾乎在同時啓動。

（二）1984年：中國的“翻譯史”年

1984年2月和11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分別推出兩集由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翻譯通訊》編輯部選編的《翻譯研究論文集》。該書第一集按照發表年代的順序，收入了1894—1948年散見於各種報刊、書籍中有關歷史上翻譯理論的論文51篇，第二集收入了1949—1983年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書籍上的譯學論文63篇。第一集的首篇為馬建忠的《擬設翻譯書院議》，其他近代翻譯家還有嚴復、梁啟超、章士釗（1881—1973）、朱自清（1898—1948）、瞿秋白、魯迅、傅斯年（1896—1950）、朱光潛、朱生豪的文章；第二集收入了54位翻譯家，如茅盾、郭沫若、董秋斯、傅雷、葉君健（1914—1999）、戈寶權的文章，還收入了港臺等海外譯家如林以亮、劉紹銘、思果、余光中、趙元任等人的作品，若干篇則選自當時大陸地區很難見到的劉靖之所編的《翻譯論集》和香港中文大學外進修部編的《翻譯十講》兩書。比較《翻譯論集》，該書收入的內容在晚清有若干拓展，如馬建忠的《擬設翻譯書院議》為劉靖之所未收，很讓大陸讀者開了眼界。兩集中除了收入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伍蠡甫《伍光建翻譯遺稿》前記，還收入賀麟《嚴復的翻譯》和劉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等若干涉及翻譯史的篇文。編者原來還計劃編纂第三集，輯錄中國翻譯史資料及翻譯家有關文章，但不知何故，第三集始終沒有出版，倒是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語文翻譯研究論文集》，體例與兩集《翻譯研究論文集》類似。

1984年5月，商務印書館推出了由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據羅新璋口述，促發該資料集問世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深編輯陳應年。當時，商務印書館已經重刊“林譯小說叢書”十種和“嚴譯名著叢刊”八種，陳應年注意到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的羅新璋曾與傅雷有過通信，並對翻譯理論有濃厚的興趣，因此建議他來編一本翻譯論集。^①該書在翻譯主題下，將各種有關翻譯研究的資料和論著編纂在一起，搜集自漢末以迄編定之日有關翻譯的文論一百八十餘篇，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當代

^① 羅新璋口述、黃莊文撰：“須臾，浮生——《翻譯論集》前後話”，《東方翻譯》2（2010）：41—45。

共五輯。與同年問世的《翻譯研究論文集》相比，該書注意從三國時的支謙《法句經序》開始，收入了古代佛教翻譯家的譯論，較之上述兩集《翻譯研究論文集》，特色明顯。而且，該書輯錄若干不為一般翻譯理論家注意的譯論，如哲學家金岳霖《知識論》中的“論翻譯”等。編者在該書前撰寫了長篇序言《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指出中國翻譯理論產生的歷史及其演變，提出了“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四個既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而漸次發展的傳統譯論的特點，提出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的主張。^①中國翻譯理論是否存在體系，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或以為羅新璋的“序言成為中國傳統譯論存有體系之說的代表性宣言，也為後來的翻譯學體系建設提供了理論參考”。^②

1984年，在翻譯史研究上第二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是大陸第一部中國翻譯史著作——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這是一本在中國翻譯史研究中具有學術標杆意義的著作。它將中國翻譯的兩個傳統——佛典翻譯和西學翻譯連在一起，填補了中國翻譯史研究體系上的空白。其特色還在於，注重少數民族翻譯活動的描述，有關藏族、回鶻族、蒙古族、傣族、滿族等譯書活動的描述尤見特色。該書在歷史分期上基本沿用歷史學科中中外文化交流的分期法，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第二次西學翻譯。較之韓迪厚的《近代翻譯史話》，內容突破了文學翻譯的局限。作為首部上下貫通的簡明中國翻譯史，作者通過翔實的資料，貫通了中國翻譯的古代佛典與近代西學兩個傳統。該書的問世，直接帶動了20世紀最後十幾年一系列中國翻譯史著作的問世，其學術貢獻功不可沒。在1984年“簡史”本的基礎上，馬祖毅在1998年還出版了增訂本，2006年又推出由其主編的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後者在研究時段上做了進一步拓展，將翻譯史研究一直延續到了當代，與之前所提出三個時期構成中國翻譯史的四大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第二次西學翻譯，改革開放後八九十年代的翻譯。這一分期對後世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影響很深。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仍然是“簡史”研究特點的延續，即資料整理得有條有理，但描述多而分析少，很多“描述性”還是屬於其他論著的“複述”，而且留有政治史敘事為主導的深刻印記，缺少了史書應有的問題意識，以及應具備的史論結合的闡釋。書中的不少陳述所採用的方法還是傳統的目錄學文獻整理方法，但從文獻資料的齊備角度來衡量，有些資料又尚欠豐厚。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不少部分或僅僅屬於資料整理與彙編的性質，而且其中不少資料的引證和出處無法考見。這一方法在其與任榮珍合編的《漢籍外譯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一書中更加凸顯，基本上是一種以目錄學為線索的資料清理；全書沒有出註，無法考見作者的資料來源，其中俄文排印錯誤嚴重。^③

重資料整理和事實陳述，輕論證分析，缺少問題意識和理論框架，幾乎成為20世紀最後二十年多種中國翻譯史研究的顯著特徵。孔慧怡在《重寫翻譯史》一書中稱；她的“重寫”是針對學術界“主流權威敘事”作出的反應。^④其實，中國翻譯史研究至今尚在起步階段，還談不上真正形成一套“主流權威敘事”。如果說中國翻譯史研究已經有所謂“主流權威敘事”，那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馬祖毅為代表的中國翻譯史的編寫模式。此一模式的主要特徵是翻譯史的內容彙編，大多以中國政治史敘事框架為主導，採用的主要的是資料彙編的方法。馬祖毅的這一“主流權威敘事”，至今仍對中國翻譯史著作的編纂產生着或大或小的影響。

^① 羅新璋編選：《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1—19頁。

^② 許鈞、穆雷主編：《中國翻譯研究（1949—2009）》（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第231頁。

^③ 陳建華主編：《中國俄蘇文學研究史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第2卷，第254頁。

^④ 孔慧怡：《重寫翻譯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第10頁。

(三) 翻譯家自述的出版

古代“文獻”是指文字資料和口述資料，“獻”指賢人，包括了他人的口述和自己的自述。所謂“口述資料”，亦稱“口碑史料”或“口碑文獻”，一般是指搜集當事人親歷、親聞，或事件參與者和知情人的口述包括經他人整理成文的史料。自述可以視為“口述文獻”的一種，記錄的主要は個人的回憶。

翻譯家自述和他人口述資料的收集，無疑是中國翻譯史研究資料的重要準備。這一方面的著作要特別提到聊城師範學院中文系王壽蘭主編的《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一書。聊城師範學院（原稱山東師範學院分院，現改為聊城大學）有從事中國現代作家小傳編纂的傳統，王壽蘭敏感地意識到不僅應當為作家立傳，也應該為文學翻譯家立傳。於是，1980年底她就計劃編一部《中國現代外國文學翻譯家研究家傳》，與該校已編刊的《中國現代作家小傳》配套；同時，趁着老一輩文學翻譯家還健在，計劃再編纂一部《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家自傳》。這一富有遠見卓識的想法得到了該校領導的贊助。於是從1983年起，通過三年艱苦的勞作，王壽蘭發函並先後到濟南、北京、蘇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走訪了140多位文學翻譯家，一方面約稿收集資料，一方面進行請教和口述記錄，^①讓這些健在的老翻譯家和正處在壯年的翻譯家總結他們多年從事翻譯的經驗與體會，形成書面文字，彙編成《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一書。

該書收入了飛白、王佐良、戈寶權、卞之琳、方重（1902—1991）、文潔若、巴金、葉君健、呂叔湘（1904—1998）、朱光潛、朱維之（1905—1999）、許淵沖、冰心（1900—1999）、李健吾（1906—1982）、李霽野（1904—1997）、楊苡、楊豈深（1909—1996）、楊周翰（1915—1989）、蕭乾（1910—1999）、初大告（1898—1987）、張友松、張谷若、陳嘉（1907—1986）、林疑今（1913—1992）、范存忠（1903—1987）、季羨林、周煦良（1916—1992）、宗白華（1897—1986）、趙蘿蕤（1912—1998）、趙景深等104位翻譯名家之翻譯短論和簡短自傳或簡歷，內容以翻譯家的翻譯經驗為主，其中有許多材料現在來看顯得特別珍貴。例如，“文革”時期“內部發行”讀物翻譯出版的史實，幾乎很少見之於其他著作，而周煦良（1905—1984）的自傳就回憶了當年他參加《摘譯》的一些史料，指出由於這一時期的翻譯出版幾乎都在“四人幫”的嚴密控制下，譯者幾乎沒有選題上的自主權，選擇什麼內容完全受到操控：“四人幫”的親信“親自‘把關’，審查每一期外國文藝的《摘譯》”，“在翻譯什麼作品的問題上，他們則根據‘洋為幫用’的原則，絲毫不考慮翻譯工作者的意見。一部作品，祇要他們認為對自己有用，就決定翻譯”。^②其中，也有若干翻譯家討論了翻譯史研究的問題，如季羨林接續着《翻譯通報》1951年5月“中國翻譯史特輯”的《對於編修中國翻譯史的一點意見》，1982年7月17日在為《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談到“直譯”和“意譯”》一文所寫的後記中，進一步指出了研究翻譯史的意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翻譯歷史之長，翻譯東西之多，翻譯理論之豐富，哪一個國家也比不上中國，這一份最可寶貴的遺產可惜到現在也還沒有認真總結、繼承。一千多年以前東晉道安提出了‘五失本’的主張，差不多同時，後秦鳩摩羅什‘手持胡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可以說是意譯直譯兩大派的代表。中間許多翻譯家都或多或少講了一些翻譯的理論。到了近代，嚴復提出了信、達、雅三個標準。雖然時間已經過了將近一百年，但是現在許多講翻譯的文章仍然提到這三個字。我也一樣。我認為這三個字實在是精練之至，用它來總結中國千年的翻譯經驗，也未嘗不可。”^③

① 王壽蘭：“後記”，《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第856—858頁。

② 周煦良：“周煦良自傳”，《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第600頁。

③ 季羨林：“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談到‘直譯’和‘意譯’”，《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第1頁。

這一屬於翻譯家親歷而口述或筆述的文集，有類似考古學上的搶救性發掘報告一般的價值，許多譯家的生平文獻和口述資料，正是依靠着該書編者所整理纔得以保存，如許汝祉（1914—2002）、孫席珍（1906—1984）、楊業治（1908—2003）、張君川（？—1999）、陳嘉等翻譯家的傳記都不見於1988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推出的《中國翻譯家詞典》，在很多翻譯家的自述中保留了不少歷史的細節和個人獨特的心路歷程。這些自述，對於後人理解那一個時代關於翻譯的歷史記憶，有着重要的價值。隨着其中不少翻譯家的逐漸離世，該書的資料價值更顯得彌足珍貴。

（四）《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

1990年，上海書店推出由施蟄存（1905—2003）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施蟄存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在文學翻譯史方面亦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在該書的“導言”中認為，佛經翻譯是“歷史上第一次翻譯高潮，給中國送來的是印度哲學和佛教。從總體上看，他們對中國沒有什麼積極的效益。從晚清到民國初年這三十年間的第二次翻譯高潮，對中國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的思想狀態，卻起過積極的衝擊和提高作用”。他闡述了翻譯與中國文化進步的關係，指出傳統章回小說中的白話文與外國文學白話譯本之間有着複雜的關聯，章回小說中的白話文仍然是書面的而非口頭的，而外國文學白話譯文“沒有譯者的方言鄉音影響，語法結構和辭氣有一些外國語跡象”，“它有時代性，有統一性，有普遍性。當時的文藝創作家，即我們新文學史上所輕蔑的‘鴛鴦蝴蝶派’，他們所使用的就是這一種白話文。特別是幾位既是翻譯家，又是創作家，如包天笑、周桂笙、陳冷血等人，他們的譯文和他們的創作，文體是一致的。這一種白話文的轉變，是悄悄進行的……是不是可以說，早期的外國文學譯本，對當時創作界的文學語言也起過顯著的影響”？^①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界對翻譯文學的認識尚未恢復到民國時期的認識水平之前，施蟄存較早地意識到本土文學與域外文學通過翻譯進行互動的複雜關係。他對於古代白話文與外國白話譯文之間的區別，以及古代白話文如何在翻譯文學的影響下轉變為新文學時代的白話文的分析，至今看來仍具深刻的洞察力。^②不過，文中對佛典翻譯缺乏認識和對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實況基本陌生，影響了“導言”論述的廣度和深度。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收入的均為五四運動以前的外國文學譯本。全書分3卷，第1卷約62萬字，選錄所謂純文學譯本，計10部長篇、18部短篇小說，其中有伍光建譯《法宮秘史》，林紹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海外軒渠錄》，吳檮譯《賣國奴》、《黑衣教士》、《憂患餘生》等長篇小說；周瘦鵠譯《星》和《馴獅》、魯迅譯《哀塵》、陳景韓譯《義勇軍》和《神槍手》、包天笑譯《六尺地》、林紹譯《李迫大夢》等短篇小說。因為選書的標準是同一個作家的作品祇選一篇，譯家也盡可能多選，因此有些重要的小說譯本，如《黑奴籲天錄》則改成一個根據林紹譯本演述的白話小說。其實，編選者也沒有完全尊重自己確定的原則，如該卷中周瘦鵠選了五篇，而且均取自《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顯然未盡合理。該卷雖然沒有選擇日本小說，但其中不少譯文是從日本轉譯的，如其中的四部俄羅斯小說。

第2卷約70萬字，全書收錄了18種近代中國編譯出的有代表性的各國長篇和短篇的通俗翻譯小說，分為科幻、怪異和偵探三大小說題材。科幻小說選了《八十日環遊記》和《火星與地球之戰爭》兩種；科幻哲理小說選了《易形奇術》；神怪小說選了林紹譯《三千年豔屍記》和《潛艇魔影》；推理小說有美國安介坡（E. A. Poe, 1809—1849, 一譯“愛倫·坡”）

^① 施蟄存：“導言”，《中國近代翻譯大系·翻譯文學集》（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1卷，第1—32頁。

^② 張英鳴：《施蟄存：媒介中的現代主義者》（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3），第140—141頁。

的《玉蟲緣》（周作人譯）和英國柯南道爾（A. C. Doyle, 1859—1930）的《懼祟》（陳霆銳譯）等，上述均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選有梁啟超譯《俄皇宮中之人鬼》，英國柯南道爾的短篇小說選了程小青譯《海軍密約》、周瘦鵠譯《病詭》、周桂笙譯《阿羅南空屋被刺案》、嚴獨鶴譯《傭書受給》等。其中日本小說收入《旅順實戰記》和押川春浪（おしかわしゅんろう，1876—1914）的《大魔窟》兩種，而後者為存目。三卷中全文收入的僅日人長篇紀實小說《旅順實戰記》一種，施蟄存解釋了為何如此重視該書的原因：“《旅順實戰記》是一部軍事紀實小說。它表現了典型的日本精神，從武士道、忠臣藏、大和魂到軍國主義，有其根深蒂固的傳統。這部小說，對日本人來說，是一部愛國主義小說，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是一部國恥小說。但是譯本出版以後，讀書界很受衝擊。我們以為現代中國人也應當看看，汲取一次歷史教訓。”^①

第3卷約59萬字，收入翻譯文學中的散文（包括遊記、隨筆、論議）、詩歌、散文詩、寓言、童話、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 1564—1616）劇本故事、天方夜譚和戲劇等類別的譯文。“遊記”有林紓等譯歐文（W. Irving, 1783—1859）的《大食故宮餘載》；“隨筆”有周瘦鵠譯英國蘭姆（C. Lamb, 1775—1843）的《故鄉》；“論議”均為嚴復翻譯中的“案語”；“詩歌”中有《聖經》雅歌以及王韜（1828—1897）、辜鴻銘、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劉半農（1891—1934）、蘇曼殊、馬君武、梁啟超、應時等名家名譯；“寓言”收入張赤山等譯《海國妙喻》等四種，《克雷洛夫寓言》為任廷旭所譯；“童話”有《格列姆童話》（今譯“《格林童話》”）、《安德森童話》（今譯“《安徒生童話》”）和《淮爾德童話》（今譯“《王爾德童話》”）；“莎士比亞戲劇”收入的是當時流行的《海外奇譚》和林紓譯《吟邊燕語》兩種故事選本；“天方夜譚”專門作為一種題材，選收了刊登於《大陸報》上佚名譯的《漁翁故事》、周作人署名“萍雲女士”譯《俠女奴》、刊登在1905年《繡像小說》上佚名譯的《龍穴合窓記》、奚若譯《天方夜譚》中的《談瀛記》；“戲劇”翻譯收入馬君武所譯的《威廉退爾》等七種。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卷》這一翻譯文學史資料彙編的價值顯而易見，但其中的選篇和考訂也有若干問題。例如，第一卷未收晚清第一部傳入中國的長篇小說《昕夕閑談》，現已知該書譯自英國作家利頓（E. B. Lytton, 1803—1873）的長篇小說《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編者在導言中對此書也隻字未提，可見不是一般的疏忽。刊登在1905年《繡像小說》上佚名譯的《龍穴合窓記》與奚若譯《談瀛記》，譯者其實是同一人——《龍穴合窓記》幾乎未經改動收入商務印書館1906年初版的奚若譯《天方夜譚》，屬“說部叢書”本。^②

（五）譯名問題討論集

譯名問題也是關於語言和世界關係的一部分。“名”給人以一種觀察世界的尺度，有了名詞纔能準確地理解事物和表述世界。歷史上的譯名問題也是翻譯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關於譯名問題的討論，最早可以上溯到佛典翻譯中“翻譯名義”。翻譯中如何給外來術語定名的問題，從唐代的玄奘、宋代的贊寧（919—1001）、法雲（1088—1158）等，直至晚清徐繼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都有過論述。譯名統一的呼籲與“因俗定契”的原則，以後始終貫穿於中國翻譯史的發展中。19世紀80年代，傳教士如傅蘭雅等在西方教科書的翻譯中為統一術語作過不懈的努力；20世紀初，任鴻雋（1886—1961）的《化學元素命名說》、蔡元培（1868—1940）的《譯名表》、鄭貞文（1891—1969）

^① 施蟄存主編：《中國近代翻譯大系·翻譯文學集》，第2卷，第3頁。

^② 鄒振環：“奚若與《天方夜譚》”，《東方翻譯》2（2013）：36—41。

的《無機化學命名草案》都對“統一譯名”的重要性作過系統的闡述。從清末學部奏設編譯名詞館，1916年教育部設立譯名統一委員會，直到抗戰時期國立編譯館公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礦物學、地質學、氣象學、動物發生學、比較解剖學、細菌免疫學、精神病理學、藥學、電機工程、普通心理學等統一譯名15種。^①

研究翻譯史無法全然繞開譯名和術語，因其直接關係着翻譯的文化價值觀。1990年，張豈之、周祖達主編了《譯名論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該書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姜椿芳（1912—1987）、錢三強（1913—1992）兩位的3篇論文，是關於譯名和科技名詞術語問題的總體論述；第二部分收入陳獨秀、何炳松（1890—1946）的3篇，主要反映五四運動以來直至1930年代關於譯名問題的討論；第三部分收入周建人（1888—1984）、王宗炎（1913—2011）、朱光潛、伍鐵平（1928—2013）、許國璋（1915—1994）等涉及譯名的11篇論文；第四部分收入張岱年（1919—2004）、賀麟、王大慶、于光遠（1915—2013）、張仲實（1903—1987）等14篇。主要討論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律學和體育學的譯名問題；第五部分收入沈志遠、雷海宗等12篇，主要討論有關統一譯名的意義、途徑和一些學科、圖書中譯名統一的原則，還包括譯名統一的建議等，都屬於結集的譯史資料的專題文獻彙編。但是，該書資料所採集的範圍過於狹窄，基本上是現代學者的討論，不僅佛典翻譯時期的名僧翻譯家關於“翻譯名義”的論述未見收錄，民國初期高鳳謙（1869—1936）、胡以魯（1888—1917）、章士釗、容挺公等以《論譯名》為題的文章，1920年2月至3月《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7月《晨報》及《民國日報》上鄭振鐸發表的關於譯名討論的相關論著，都未見收入。其他如現代臺灣學者王樹槐的《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輯），更是不曾注意到。

綜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是大陸學術界開始復蘇並重新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突出成就，在於史料的整理和初步的研究。由於此時大陸學術界還處在“撥亂反正”階段，初期的研究成果呈現出某種政治史敘述的框架，但在翻譯史資料整理方面的成就則非同一般。其一方面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中國翻譯史資料清理工作的漠視狀態，另一方面也一反“文革”前後那種以論帶史的研究取向，避免了學術服務於國家意識形態，從方法論上重新回到了翻譯史傳統上對學術的資料性和客觀性的尊重。這些中國翻譯史史料的清理和研究，提供了此一時期史家意識和資料選家的獨特眼光。

四、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

從1984年至2000年，堪稱中國翻譯史研究的一個“學術復興”期，代表性著作的出版蔚為大觀，形成了各種不同內容體例的中國翻譯史成果，建構了中國翻譯史研究上的所謂“多元格局”。表現在內容上，是翻譯史研究的廣泛拓展，有翻譯文學史、科技翻譯史、翻譯理論史、區域翻譯史、翻譯出版史、口譯史、翻譯教學史、翻譯文化史等；在編纂形式上，誕生了以譯書為中心的翻譯史、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譯事為中心的翻譯史、以翻譯形式為核心的專題翻譯史論文集等編寫形式。

（一）文學翻譯史和翻譯文學史

什麼是“翻譯文學”，什麼是“文學翻譯”，至今仍是學術界討論的重要議題。楊武能認為，“翻譯文學與文學翻譯關係密切，常易混為一談，卻並非同一個概念：文學翻譯定性於原著的性質，與之對照的是其他門類的翻譯，如科技翻譯、軍事翻譯，等等；翻譯文學定性於譯著的質地和水平，即本身必須仍舊是文學。因此，後者並非前者的必然結果，而祇

^① “國立編譯館工作概況”、“抗戰時期之學術”，《革命文獻》（臺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2），第59輯，第411—455頁；鄭振環：“《瀛環志略》譯名試譯”，《疏通知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55—362頁。

是其成功的高水平的結果”^①。類似的很多所謂翻譯文學史，實際上祇是文學翻譯史。例如，陳玉剛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以文學翻譯活動的事實為基礎，力圖對晚清同文館及早期翻譯家梁啟超、嚴復、林紓等人的翻譯活動，對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未名社等人的翻譯活動，以及1949年後的翻譯活動作條分縷析，提示一條清晰的脈絡。以現在的目光來看，該書註釋非常簡略，也不很規範；令人困惑的還在於，該書與1960年一度作為翻譯史教材的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專業1957級學生所編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對照，不僅在章節安排和分期時段上“竟如出一轍”，即使在編寫方式上，思路也非常相似。^②同類文學翻譯史中，頗見獨創性的是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該書擺脫了上述傳統政治史分期的框架，採用上下篇的形式。上篇是近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及其主要特點的鳥瞰，綜合討論了翻譯文學理論、詩歌翻譯、翻譯政治小說、翻譯偵探小說、翻譯科學小說、翻譯戲劇述略、伊索寓言的翻譯等；下篇以翻譯家為綫索，先後討論了梁啟超、嚴復、林紓、蘇曼殊、馬君武、周桂笙、伍光建、曾朴（1872—1935）、陳景韓（1878—1965）、包天笑、周瘦鵠、魯迅、周作人、胡適、陳獨秀、劉半農等，最可貴的是作者注意到了以前被文學翻譯史所忽視的人物，如奚若（1880—1935）、吳檮、戢翼輩（1878—1908）、陳嘏等。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作者最早注意到近代翻譯小說中女性譯者出現的文化現象，初步討論了薛紹徽（1866—1911）、陳鴻璧、張默君（1883—1965）、黃翠凝（1875—？）、陳信芳，為近代文學翻譯史上女性譯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綫索。^③

（二）科學翻譯史料的清理

在科學翻譯方面貢獻最突出的是黎難秋。他先後編纂了《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和《中國科學翻譯史料》（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其實，後者是前者編纂的資料準備和基礎。前者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敘述了漢晉至清末科技文獻的通史，中篇分學科介紹了西方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生物學、醫學等知識傳入中國的過程及其作用，下篇介紹科學文獻翻譯對語言學、近代教育、圖書館事業和科技情報工作的影響。由於需要論述的面過於寬泛，因此，上中兩篇基本流於泛泛敘述，下篇確有作者的若干心得，礙於篇幅所限，許多問題尚未展開。後者將所收資料劃分為“奏疏”、“序言識語”、“目錄提要”、“論述”、“翻譯機構”、“翻譯人物”和“長篇專文”七個部分，雖然分類未盡合理，但為翻譯史料如何編纂提供了最初的範本。正是在此基礎上，作者還與《中國科學翻譯史料》副主編李亞舒合作，完成了篇幅更大的《中國科學翻譯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雖然該書在體系上較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並無大的突破，但重視言語翻譯（口譯）與文字翻譯（筆譯）顯示了作者不同尋常的編纂翻譯史的思路。湖南出版社於2000年又推出了李亞舒、黎難秋主編的《中國科學翻譯史》。全書六十萬字，分為五篇：第一篇總論，凡四章，討論了科學翻譯史研究對象、基本理論和發展，以及創立譯學的設想；第二篇有三章，討論漢至明初的科學翻譯；第三篇有四章，討論明清兩代的科學翻譯，其中涉及科學翻譯理論的發軔；第四篇有六章，討論民國時期的科學翻譯，其中涉及科學譯名的統一與雙語科學辭典的編纂；第五篇有十二章，討論新中國的科學翻譯，包括科學翻譯人才的培養、口譯的發展、機器翻譯的發展等。全書較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論述範圍有了更大的拓展，比

^① 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86頁。

^② 謝天振：《譯介學》，第220—222頁。

^③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17—120頁。

較系統地論述了各個歷史時期科學翻譯的成就、譯員活動、譯才培養和譯書機構的建設等，特別是第五篇篇幅幾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反映了編者厚今薄古的編史思路。但是，全書基本上沒有擺脫史料清理的編纂模式——詳陳述而略分析。

科學翻譯史的編纂有着很大難度，真正懂得科學的學者未必願意花力氣來做科學翻譯史，而非科學專門領域的學者來做又多流於泛泛而論，科學翻譯需要綜合討論，更需要分科研究。屬於科學翻譯史分科研究方面還有鄒振環所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該書前半部分先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創辦作為晚清地理學譯述的起點，以點綫面的陳述方法討論利瑪竇世界地圖以及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學知識點的輸入，再以19世紀西方傳教士的西方地理學譯著作為綫的傳播，將戊戌至辛亥時期西方地理學譯著作為知識體系面的傳播來敘述。作者將收集到的208種西方地理學著作，分“地理學通論與教科書”、“地球與地文學”、“氣象與氣候學”、“文化與政治地理學”、“區域地志”、“商業地理學”、“交通與旅遊地理學”、“軍事地理學”、“地圖冊與地圖解說”九個部分繪製了《晚清西方地理學譯著知見錄》。該書後半部分研究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影響”，為了將影響研究建立在量化和實證的基礎上，全書以地理學專業術語、地理學教科書、地理學共同體的形成三個方面，建構闡述影響的三個面向。

（三）譯學理論與翻譯思想史

最早提出“譯學”這一概念的是梁啟超，他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的第五節指出：“欲察譯學之進步，莫如將同本異譯之書為比較的研究。”^①這一簡要的界定大致可以認為，“譯學”係“翻譯科學”的簡稱。可喜的是，1992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陳福康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中國譯學理論史。該書按照一般的歷史分期，將譯學理論史分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四部分，作者不以論帶史，而是按照歷史的順序，挑選一些重要的譯論家，分別介紹其生平，評價其譯學理論，在史料處理上條分縷析，頗顯採擷資料的功力。缺點是，沒有仔細區分譯學理論與一般翻譯思想和言論的差別，混淆了理論與實踐，將一些屬於翻譯實踐的內容都寫入了著述，如林則徐（1785—1850）等；類似“洋務派的翻譯主張”、“老一輩革命家談翻譯”，這些個別的有關翻譯的談話，實在算不上譯論，放在其中顯得不倫不類；而近代有些有着重要譯論的學者卻被遺漏了，如邵作舟《邵氏危言》中的《譯書》等。^②嚴復的翻譯理論是中國翻譯理論永遠繞不開的話題，沈蘇儒的《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主要考察嚴復翻譯理論在中國譯學史上的地位；而如何將翻譯理論與傳統文化的背景以及讀者接受心理結合起來加以考察，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做了很好的示範。該書將綜合分析和個案研究結合在一起，論述了嚴復、梁啟超、魯迅、梁實秋、瞿秋白等的翻譯理論，從他們各自的文化政治立場出發，指出了他們之間翻譯思想的承繼、對抗與交融的情況，力求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歷史坐標中尋找他們分歧和相融的原因。

（四）翻譯出版史

最早將“翻譯出版”作為一個整詞加以討論的是李景端。他呼籲建立“翻譯出版學”，指出這一學科的任務是闡明翻譯出版體系的基本原理和歷史演變，揭示翻譯出版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及其在不同狀態下的特殊規律，研究和調整翻譯出版全過程中各種環節的制約因

^① 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第113頁。

^② 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472—475頁。

素。^①遺憾的是，“翻譯出版”的概念與“翻譯出版學”一說，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注意。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翻譯辭典》中以“翻譯”為詞頭的共有93條，但獨無“翻譯出版”；而2011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國譯學大辭典》，其中收入以“翻譯”為詞頭的多達171條，連翻譯課、翻譯產業、翻譯服務、翻譯工具、翻譯教材都單獨列了條目，唯有“翻譯出版”未列專條，實在匪夷所思。翻譯出版的研究涉及譯作的社會存在，取決於譯者、出版者、讀者的相互關係，而翻譯出版史研究正是以譯作的生產與流通為中心的翻譯外部史研究。之前，臺灣學者釋道安的《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已經有過很好的示範。鄒振環先後完成了兩部以“翻譯出版”為題的地域出版史，一為《江蘇翻譯出版史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二是斷代的《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前者是一部江蘇地區性的自古至1930年代的翻譯出版史，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佛典翻譯，下編為西學翻譯。作者首次以徐光啓至劉智為線索考察了明清之際的翻譯出版，全書基本上是“外譯中”的歷史，附錄部分討論“江蘇地區的漢籍西譯和江蘇譯家的中譯外活動”，彌補了“中譯外”資料的不足。後者的主體框架包括九個章節，縱向以編年史的形式對上海翻譯出版史料進行了梳理，並對各個時期橫向地以出版活動為核心，對譯家、譯作、翻譯機構和文化社團、文化論爭與翻譯出版的關係加以分析，從而論證上海翻譯出版與上海文化變遷的關係。^②

（五）翻譯教學史

中國有着漫長的翻譯教學史，可惜譯界至今尚無一部完整的翻譯教學史。但是若干專題研究卻引人注目，如1984年臺灣的蘇精有關於同文館三館的新作《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在原舊作《清季同文館》的基礎上，有更多新資料的增補，研究專題也有拓展。穆雷《中國翻譯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儘管是以研究翻譯教學現狀為主要內容，但該書第一章則是對中國翻譯教學歷史的回顧，作者將翻譯教學的歷史分為“20世紀以前”、“1902年—1949年”、“1949年—1979年”、“1977年至今”四個階段，指出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翻譯教學在大陸受到忽視，先行一步的是香港和臺灣地區。1972年，香港中文大學就成立了翻譯系；之後，香港浸會大學、城市大學也有了授予翻譯專業碩士學位和以翻譯研究為方向的博士學位；其他如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嶺南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都可以授予翻譯學專業的學士學位；1988年，臺灣地區的輔仁大學外國語言學院也成立了第一個翻譯學研究所；1996年，臺灣師範大學也成立了翻譯研究所。該書通過中國翻譯教學歷史的考察，搜尋翻譯教學的歷史淵源，分析翻譯教學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具備的特點，指出翻譯教學一直是歷史上外語教學的組成部分，中國翻譯教學的歷史與中國外語教學的歷史緊密關聯。^③由於全書採用了詳今略古的方法，因此對古代有關翻譯教學的史料沒有進行系統開掘。其實，早在元代，就設立了培養譯員的專門學校“回回國子監”；明清兩代的“四夷館”中也有譯員的培訓工作。留存至今的《華夷譯語》在明清兩代翻譯教學史上起到了何種作用，實在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六）斷代翻譯史

這裏所稱的“斷代”不完全是王朝斷代史的意思，也包含一個時期一個階段的翻譯史。斷代翻譯史可以是隋唐佛典翻譯史、元代翻譯史、明代翻譯史、清代翻譯史等，但目前翻譯史的研究尚未成熟到足以編寫完整的王朝斷代史階段。1996年，譯林出版社推出的孫

^① 李景端：“翻譯出版學初探”，《出版工作》6（1988）：94—103。

^② 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第319—348頁。

^③ 穆雷：《中國翻譯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第1—26頁。

致禮《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被認為是第一部斷代翻譯史。該書第一編將1949年以後17年間出版的460種英美文學譯作按照體裁分類，以編年的線性為序，詳盡介紹了這些譯作的出版情況，屬於通論性概述；第二編將26位翻譯家分為莎劇翻譯家、詩歌翻譯家、小說翻譯家、綜合性翻譯家，評介了他們的生平、譯作、翻譯思想以及譯作影響，是以譯家為中心的一部現當代翻譯史；第三編總結了17年翻譯史給研究者的經驗和啓示。

（七）區域翻譯史

1994年，新疆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由熱扎克·買提尼牙孜主編的《西域翻譯史》。這是一部從區域方法來考察歷史上翻譯活動的代表作。東起陽關、玉門，西越葱嶺的廣大地區，有着操漢藏語系、阿勒泰語系、印歐語系等不同種族部落匯聚此地，也是宗教文化最為複雜的地區，薩滿教、道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曾廣泛傳播在這一區域，伊斯蘭教文化與儒家文化也在這裏交匯，促成了這一地區活躍的翻譯活動。該書從先秦一直寫到清代，首創了區域翻譯史編纂的體例。斷代的區域翻譯史還有陳世明的《新疆現代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該書作為《西域翻譯史》的續篇，勾勒出現代新疆地區翻譯事業的全貌。全書分上下兩編，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新疆近一百年翻譯事業的發展，填補了民族語文翻譯史研究領域內的一大空白。上編有兩章：第一章“民國時期的官方翻譯活動”，第二章“非官方文字翻譯活動及翻譯事業的特點”，主要討論了民國初期至新疆和平解放約四十年裏，新疆各民族翻譯實踐活動和翻譯事業發展的大致情況。下編有四章：第一章“黨政部門的翻譯活動”，第二章“非黨政部門的文字翻譯活動”，第三章“翻譯理論的研究和發展”，第四章“當代翻譯名家簡介”，主要論述了新疆和平解放至1990年代約四十年裏新疆各領域翻譯活動的實況。

（八）翻譯文化史與比較翻譯史

翻譯是文化交流的產物，翻譯活動離不開文化。王克非正是從此一角度提出：“翻譯文化史主要就是從歷史發展上研究這兩者的關係。……它不同於一般的文化史……也不同於翻譯史，因為它的重點不是翻譯人物、翻譯活動、翻譯機構、翻譯流派等等。翻譯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譯對於文化（尤其是譯入語文化）的意義和影響，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對於翻譯的制約，特別是在通過翻譯攝取外域文化精華時，翻譯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發生什麼樣的變異。”^①該書其實並非翻譯文化史的研究，而是把編者認為比較經典的論文，如梁啟超、胡適論佛經翻譯，賀麟論嚴復的翻譯，錢鍾書論林纾的翻譯，鄭振鐸論清末翻譯小說，錢存訓論近世譯書以及譚汝謙論中日之間譯書史等論文編纂在一起，也選編了鄭振鐸撰寫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中的相關內容，其中若干部分是編者編譯的日本“明治時代的翻譯文化”。這些論文係有關翻譯史研究填補空白之精心之作，很多具有經典性，但優秀的翻譯史論文並非即翻譯文化史研究。由於編者對究竟如何系統進行翻譯文化史研究並無實踐，因此最後也祇能說“翻譯文化史研究實質上是翻譯史與思想史、文化史的結合”。^②該書編者雖然沒有講清翻譯文化史究竟是怎樣一種模式，但編者另外完成的《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一書，通過嚴復與中村正直（なかむらまさなお，1832—1891）的關於約翰·穆勒（J. S. Mill，1806—1873）《論自由》等譯作中如何傳達、增添、擴伸和變形等問題，揭示了中日兩國翻譯家在跨文化實踐中所呈現出的獨特價值。這一研究實例讓讀者多多少少瞭解了王克非所提出的關於編纂翻譯文化史的構想，

^{①②}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第2—3、3頁。

實際上還有着重要的比較翻譯史的意義。如何將翻譯史的史料碎片在氣脈貫通的文化追懷這一宏大思路的觀照下，得到了圓融有力的整合，需要研究者作進一步思考。

（九）以譯作為中心的翻譯史

用譯作為和譯品來考察中國翻譯史，不失為一個研究翻譯史的視角。代表作品有鄒振環所撰的《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該書討論了明末《幾何原本》至1949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百種譯作，“用史家的視角，文學家的筆法記錄我國四百年來的翻譯活動，其中史料與人物並錄，評論與爭鳴競存”，不僅介紹了一百部著作的原著，也對不同譯本有所論及，將史實與佚聞有機地結合起來。^①袁錦翔的《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一書也可歸於此類。該書以翻譯名家與名作為中心，討論了林紹、嚴復、梁啟超、辜鴻銘、魯迅、郭沫若、李達（1890—1966）、林語堂、茅盾、鄭振鐸、聞一多（1899—1946）、巴金、朱生豪、楊憲益（1915—2009）以及傅蘭雅、理雅各、翟理斯、韋利等三十餘人的譯作，作品涉及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科技、歷史、哲學等經典，其中大部分譯作都是世界名著的翻譯。該書採用了研究與賞析結合的形式，研究中有賞析，賞析中有研究，既注意學術研究需要，也兼顧了可讀性。

（十）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

中國傳統史學有着注重“人”的傳統，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建構歷史的典範。以某一翻譯家為中心來揭示翻譯史的演變，鄭振鐸等已經有過嘗試，1964年錢鍾書完成的單篇論文《林紹的翻譯》，亦以林紹為個案討論了近代翻譯文化的演變。1980年代以來，也有類似將同類的具有共性又有個性的多位翻譯家根據年代編排在一起，形成一種翻譯史的編纂形式。如中國佛教協會編有《中國佛教》（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第二冊為“中國佛教人物”，收入了東漢的安世高、支謙、東晉道安，一直到清末楊文會（1837—1911）等92位佛學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佛典翻譯家；顧長聲的《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收入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29位新教傳教士，其中至少有20位以上參與過晚清的西書中譯。以翻譯家為中心編纂的翻譯著述還有郭著章的《翻譯名家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研究了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林語堂、徐志摩、茅盾、梁實秋、錢歌川（1903—1990）、張谷若、巴金、傅雷、蕭乾、戈寶權、王佐良、許淵沖16位著名的翻譯家，一方面討論其翻譯特色，一方面編纂其譯事年表。

（十一）編纂形式上的史話本和圖文版

最早以史話形式處理翻譯史的是阿英，可惜他的章回體《翻譯史話》沒有寫完。1991年，山東教育出版社推出了臧仲倫《中國翻譯史話》，基本上是利用現有翻譯史的研究成果，加以通俗的表述。200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了《百年中國史話》叢書之一——王曉丹《翻譯史話》，整套叢書旨在向青少年讀者講述中國歷史，全面、立體地反映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10年間，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的歷史。全書由“引言”和六大部分組成：（1）西方近代科技書刊的翻譯；（2）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書刊的翻譯；（3）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4）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5）西學東漸之影響；（6）重要翻譯作品著譯者及刊行年代；基本上也是利用前人的研究作普及性的陳述。比較突出的還有，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舊蹤叢

^① 侯向群：“翻譯研究的珍貴史料、歷史探討的獨特視角——讀《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2002）：127—128。

書”中鄒振環撰寫的《譯林舊蹤》，以晚清以來譯界的舊人舊事為線索，採用圖文互動的形式，在那些被歷史慣常的“宏大敘事”所塵封遺忘的舊事背後，用通俗的語言敘述現代中國如何通過翻譯西籍以向域外求新知，旨在追尋譯壇、譯者以及譯事背後的深層意蘊。這種採取歷史切片式的寫法，注重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復原意蘊豐富的歷史片斷、時光瞬間、舊年場景與人物個體等歷史的碎片，讀者獲得了重回歷史現場的接受效果。^①

（十二）以翻譯史研究為核心的專題論文集

雖然1984年商務印書館曾推出過將各種有關翻譯研究的資料和論著編纂在一起的“專題裒纂本”——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但該書主要是各種翻譯資料的彙編，並非翻譯史的專門研究，真正以翻譯史研究為核心的專題論文集的出現是在20世紀末。1983年，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定名為“翻譯研究中心”；進入90年代，他們開始致力於推動翻譯史的研究；1997年設立了“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明確強調“文化與歷史方向的探討”。^②該中心此一時期翻譯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起推出的由該研究中心孔慧怡策劃主持的“翻譯研究論叢”第1—3輯，主旨為探討“中國翻譯傳統”。策劃者認為，“過去中國的翻譯研究，一直以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為主要任務，很少涉及翻譯活動如何在主體文化裏面運作的問題。這一論叢的目標是嘗試從主體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翻譯的傳統，希望通過分析前人的經驗，對翻譯活動的文化意義以更深的理解”^③。第1輯為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收入了1996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近代文學翻譯與創作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其中包括大陸學者王曉明、熊月之、王繼權、郭延禮、袁進、范伯群、夏曉虹、陳平原；香港學者卜立德、孔慧怡，以及海外學者王德威、樽本照雄等有關晚清以來各類翻譯小說研究的專題論文。第2輯是孔慧怡的個人專題論文集《翻譯·文學·文化》，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英譯中”，主要討論晚清的偵探小說翻譯、翻譯小說中的婦女形象等；第二部分是“中譯英”，討論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對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國文學集》的書評，以及譯詩理論的討論；第三部分是“偽譯專論”，主要是討論佛經中的疑經和偽經，以及晚清一個著名的偽譯個案《景善日記》的分析。第3輯是孔慧怡與臺灣學者楊承淑編《亞洲翻譯傳統與現代動向》，是1998年4月在臺灣輔仁大學舉行的“亞洲翻譯傳統與現代動向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彙編，收入了來自兩岸三地的王克非、臧仲倫、張佩瑤、何佩玲、吳思齊，以及若干外國學者的論文，論題涉及中國的翻譯傳統、朝鮮時代的漢語譯官、近代日本的翻譯規劃、明治時代的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翻譯傳統，以及現當代的韓國翻譯動向、臺灣文學翻譯等。這一以翻譯史研究為核心的專題論文集，成為形成兩岸三地研究者學術共同體的一個標誌。

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中國翻譯史研究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隨着8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出現的多元化趨勢，經濟的多元化也影響到社會與文化，史學研究也呈現出多元性和豐富性的走向，幾乎目前所見的所有不同內容體例的重要翻譯史的編寫形式都在這一時期出現，並形成了相當的規模。這種研究上的“多元格局”，影響着21世紀以來的翻譯史研究。雖然其中許多研究尚屬基本翻譯史資料的整理工作，在學術研究的深度上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入的空間，但可以預言，這一時期所形成的翻譯的多元政治已經形成定局，諸多研究規範還會在很長時期裏從正面和負面主導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展。

^① 張國功：“喜‘新’莫厭‘舊’——《舊蹤叢書》”，《中華讀書報》2000-12-06。

^② 王宏志：“走向翻譯的歷史”，《走向翻譯的歷史：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2013），第3卷“翻譯史”，第1—35頁。

^③ 孔慧怡：“論叢總序”，《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1—4頁。

結 語

1902年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富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份，梁啟超在這一年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新史學》，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中國翻譯史的研究也起始於這一年的《譯書略論》。民國時期蓬蓬勃勃的翻譯史研究承接清末發軔的中國翻譯史研究，20世紀50—70年代兩岸三地的翻譯史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轉折，在大陸處於研究低潮的階段，臺灣和香港的學者仍然承繼了民國時期的學脈，70年代末期大陸的翻譯史研究再度興起，並在1984年後走向高潮，兩岸三地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已顯示出研究的多元格局——不僅有翻譯文學史、科學翻譯史、翻譯理論史、翻譯出版史、翻譯教學史以及宏觀視野下的翻譯文化史；也有區域翻譯史、口譯史，以及以譯書為中心的翻譯史、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以譯事為中心的翻譯史、以翻譯形式為核心的專題翻譯史論文集。

翻譯的政治是國家政治建構的顯現，翻譯史的敘述其實也是國家敘述的一部分。1902年開始的翻譯史研究，從點點滴滴，到涓涓溪流，直至20世紀末逐漸匯成了氣勢磅礴的海潮般洶湧的大浪，兩岸三地在中國翻譯史研究上開始了廣泛的交流，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為核心，不僅在香港主辦活動，還在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研究叢刊。從20世紀90年代起，大陸的陳平原、夏曉虹、王曉明、郭延禮、袁進、范伯群等到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講學和交流；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則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指導翻譯史研究的博士論文；大陸學者鄒振環和臺灣學者黃克武、李奭學等，也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的名譽研究員，由該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也陸續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至此，兩岸三地的翻譯史研究，已由前此分途而日漸趨合，學術界逐漸有了愈來愈多的學術共通話語，21世紀的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新局面已見開朗。

中國翻譯史研究在經歷了起承轉合後，終於在20世紀末形成了兩岸三地多元研究的新格局，為21世紀中國翻譯史從復興走向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進程中，翻譯史研究也從一般的材料收集、整理歸納，到系統翻譯史的編纂，經歷了從政治史、比較文學史，到思想史、書籍史、報刊史、出版史、社會史等多層面的轉向。自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翻譯史研究，無論理論上還是方法論上，仍然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基本上還處在政治史分期、文化史編纂、比較文學理論的陰影下，至今並未形成獨立的學科。翻譯的內部史和外部史研究的方法仍需要探索，翻譯史尚未形成屬於自己學科獨特的文獻學。^①一部高質量的中國翻譯史著作，不僅對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有着重要意義，實際上也影響着中國學術史和文化史的編寫。因為，翻譯史是中國學術專門史的重要構成；離開翻譯史的研究，忽視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成果，實際上根本無法真正寫就一部高質量的文學史或文化史。同樣，離開翻譯史的成果，人們也無法寫全一本中國現代學術史。

[作者註：本文初稿在2013年12月21—22日曾提交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國現代史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暨“吳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之後在修訂期間，承蒙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黃一農教授主持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研究計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資助。在此特向給予本人在清華大學訪學期間提供多方幫助的徐光台教授、顏健富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

^① 鄒振環：“西學漢譯文獻與中國翻譯史研究”，《東方翻譯》4（2011）：9—19。